

元顺帝宣文阁改址及其学术价值

赵利光

内容摘要:奎章阁、宣文阁及端本堂分别为元文宗、顺帝及其太子专属文化机构,在元代文化史上曾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学界对二阁沿革及宣文阁与端本堂的关系定位上存在一定失实。通过考辨正史、诗文集等史料,可证实宣文阁在奎章阁旧宫仅暂设一年便迁址大内,并于至正九年在奎章阁、宣文阁旧址设立端本堂,执掌太子教育。宣文阁改址表明其与端本堂并非设在同一宫阙,因此二者并非从属关系。

关键词:奎章阁 宣文阁 端本堂 改址

奎章阁、宣文阁及端本堂是元中后期文宗、顺帝及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儒家经典与鉴藏书画的殿阁,先后有虞集、柯九思、康里巎巎、揭傒斯、欧阳玄、周伯琦和危素等近百位善书儒士入侍燕闲,对元代皇室之汉化及文学、艺术皆有重要影响。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两阁一堂”逐渐引起历史、文学和艺术等不同科学家的重视并取得了新进展,但对其沿革及彼此关系仍存在问题。如台湾艺术史学者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①一书堪称巨著,但忽视了宣文阁改址史实和元大都宫阙制度,因而错误定位了其于端本堂之关系。高埂《元大内宫殿考证》^②、王岗《元大都宫殿营建及其功能述略》^③二文涉及宣文阁改址史实,但极其简略。本文即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正史、诗文集等,对奎章阁改宣文阁及宣文阁改址诸细节详加考辨,理清了其于奎章阁、端本堂之关系,为进一步研究阁内职官设置及彼此关系打下基础。

一、奎章阁改宣文阁之背景

若釐清宣文阁改址之复杂背景与原因,必须从奎章阁之废置谈起。元文宗即位后于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至顺元年(1330)

①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台北经联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第45-46页。

②高埂:《元大内宫殿考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S1期,第125页。

③王岗:《元大都宫殿营建及其功能述略》,《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58页。

正月升群玉内署为群玉内司,奎章阁学士院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都达到了最大规模,并执掌经筵、史书编纂、教育和书法四大职能,成为文宗执政与复兴文治的典型标志。然而,奎章阁学士院始终在皇帝和蒙元权贵的政治博弈中艰难发展。更甚者,文宗于至顺三年(1332)八月崩于上都,年仅七岁的明宗次子宁宗在位仅五十馀天后,年方十四岁的顺帝妥欢帖睦尔于至顺四年(1333)年夏即位。此时,念其尚幼,伯颜则总揽文武政权于一身,并于至元间(1335-1340)以奎章阁学士院大学士兼领学士院事。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记之甚详:

至顺之世,燕铁木儿独相,伯颜虽与同功,不操大柄。及燕铁木儿死,妥欢帖睦尔汗登极。伯颜以翊戴功,晋位太师。拜中书右丞相,上国柱,兼修国史,兼奎章阁大学士,领学士院、太史院,兼领司天监,寻奏复经筵,加知经筵事。^①

伯颜在奎章阁发展进程中的唯一积极意义则是恢复经筵制度,使年属尚幼的顺帝接受经筵讲官的儒学、文史教化。但从史料来看,已时断时续,难与文宗时比肩。伯颜插手奎章阁学士院的实质目的仍是借职位之便进一步控制顺帝。

伯颜最终还是扮演了阻碍奎章阁发展的角色。述其“罪状”,主要有三:其一,于至元元年(1335)六月,力排汉臣众议,罢黜科举,认为“科举取人,实妨选法”^②。我们知道,元代科举虽实施较晚,开科也时断时续,但自皇庆二年(1313)诏行首科,至元统元年(1333)已行七科,这无疑为汉族读书人入仕扩充出路。本来汉人、南人入仕途径就十分狭窄,伯颜此行,更使志向以读书进身者雪上加霜;其二,至元三年(1337)伯颜奏禁汉人、南人执兵器,又诏禁汉、南人学习蒙古、色目文字,诸中央、地方衙门幕长并用蒙古、色目人,皆出于其策;其三,进言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后因顺帝不从遂作罢。因此,伯颜诸行多针对汉人、南人,这让以汉族儒士为主体的奎章阁学士院形同虚设,亦加重了蒙汉矛盾。所以屠寄评之曰:“春秋之义,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此不足为燕铁木儿、伯颜道也。彼第顾私恩,争权势,它何知焉!”^③伯颜倒行逆施、专权恣肆的行径被屠氏一语道破。

在其当政七年间(1334-1340),奎章阁虽未废置,顺帝偶尔御临其中学习儒家经典,或礼遇阁臣,如命承制学士尚师简撰《奎章阁题名记》和篆学士院登瀛榜^④,甚至对沙剌班、康里巎巎欲尊以师礼^⑤,但因柯九思罢官、虞集致仕,顺

①(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列传第百有八,《元史两种·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61页。

②(明)宋濂等纂:《元史》卷一百四十二《彻里贴十儿》,中华书局,2011年,第3405页。

③(民国)屠寄:《蒙兀儿史记》,列传第百有八,《元史两种·下》,第764页。

④(元)危素:《侍读学士尚师简神道碑》,李修生等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8册,第443页。

⑤(元)杨瑀:《山居新语》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211页。

帝初期的奎章阁文化活动甚是沉寂。如萨都刺诗描述：“奎章三月文书静，花落春深锁阁门。玉座不移天步远，石碑空有御书存。”^①再无文宗时“日日退朝书满床”^②的繁盛之景。

二、顺帝对文宗的清算及奎章阁之废置

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罢相,三月卒于龙兴路驿舍。与脱脱合谋铲除伯颜后,顺帝始亲政,同年三月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进行改革。恢复科举,重用儒士,兴国学教育,史称“脱脱更化”或“至正更化”。是年,巉巉进翰林承旨学士,治书侍御史达识帖睦迺为奎章阁大学士^③,揭傒斯拟擢为侍书学士。政局更张之下,沉寂了八年奎章阁学士院似乎有了重振繁荣的端倪。

然而,奎章阁能否恢复往日繁盛,最终还是取决于顺帝之态度。如何看待文宗是顺帝终需面对的问题,因为文宗与顺帝的两对矛盾还未解决:一是文宗弑顺帝父亲明宗而夺其皇位;二是文宗在位期间,有意以虞集奉诏敕书立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皇太子,称长子(即顺帝)非明宗亲生,故顺帝必会怀恨于心。在伯颜当政时期,顺帝年幼且跟脚未稳,仍循旧制,先后两次组织对文宗的告祭活动。如元统二年(1334)正月“以上文宗皇帝谥号,遣官告祭于南郊”^④。至元三年(1337)九月,“文宗新主、玉册及一切神御之物皆成,诏依典礼祭告”^⑤。随着皇权稳固与时机之成熟,顺帝终于开始清算与文宗的矛盾。至元六年(1340)六月下诏撤文宗庙号,并颁布诏书告示天下。据《元史》所载,诏文近三百字,所列文宗罪状不外乎弑父、立储二事。至此,在宫廷全面展开清算文宗及其势力背景之下,作为文宗一手组建的奎章阁学士院当然也难逃此劫。是废置还是更名,围绕该问题,朝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三、宣文阁改址辨析

据元代文献,围绕奎章阁的废置与宣文阁建立问题,朝臣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里尚须注意,虽然史料有时把奎章阁和奎章阁学士院等同为一,但严格来讲,奎章阁属宫阙概念,是学士入直之所,奎章阁学士院是职官概念。明确二者区别,有助于理解废置先后顺序。

关于奎章阁的废除时间与宣文阁的设置时间,《元史·顺帝纪》、《百官志》和人物传记之间时有扞格,且宋濂《芝园续集》和周伯琦《近光集》之记载亦有

①(元)萨都刺《奎章阁感兴》,殷孟伦等点校:《雁门集》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0页。

②(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七,《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226页。

③(明)宋濂等纂:《元史》卷四十《顺帝三》,中华书局,2011年,第855页。

④(明)宋濂等纂:《元史》卷三十八《顺帝一》,第820页。

⑤(明)宋濂等纂:《元史》卷三十九《顺帝二》,第842页。

出入。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研读这些史料时,究竟以何人何书为依据?这时我们必须考察史书纂修人物所处之时代。《元史》为明初宋濂等人纂修,文宗以前史事主要依据各朝《实录》、文宗朝《经世大典》和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等,可谓有典可依。但顺帝朝事迹,据陈高华先生研究,主要是依据洪武二年(1369)在全国范围内的采访^①。那么,这种“口头”史料就很难保证每条信息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周伯琦参与了改制过程中的部分工作,如诏书“宣文阁”榜及“宣文阁宝”书画鉴藏印,且首任宣文阁授经郎,并以日记形式记载相关艺文、史事于《近光集》,故周氏所记足可称信。《元史》之记载则不能不信,亦不可全信,需详加考辨。参稽史料,元大都宣文阁先后有两处^②,一在兴圣宫,即奎章阁旧址;一在大内延春阁附近。为便于区分,我们姑且以新、旧称之。依宣文阁之旧址、新址为关捩大致可理清改制历程。

奎章阁、奎章阁学士院的废除与新、旧宣文阁的建立都在至元六年年底。《元史·百官志八》记“至元六年十一月,罢奎章阁学士院”^③。《顺帝纪三》同年十二月戊子,“罢天历以后增设太禧宗禋等院及奎章阁”^④。《元史·巉巉传》载:

大臣议罢先朝所置奎章阁学士院及艺文监诸属官。巉巉进曰:“民有千金之产,犹设家塾,延馆客,岂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学房乃不能容耶?”帝闻而深然之,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艺文监为崇文监,存设如初,就命巉巉董治。^⑤

虽传记未标注时间,改革发生在至元六年(1340)毋庸置疑。这与周伯琦《近光集·自序》称至元六年十一月三日建宣文阁、十一月二十八日诏篆题宫榜^⑥一事相吻合。奎章阁位于兴圣宫西廊,“即日改奎章阁为宣文阁”和“存设如初”皆说明此时宣文阁并未精心布置,仅有其名而无具体工作之实,甚至连宫榜也没有。元人诗文集亦无描述该时段内顺帝、朝官出入宣文阁之史实记载。种种史料皆说明此时旧宣文阁只是遵从巉巉谏议暂时代替奎章阁的权宜之计,属过渡性机构。

与此同时,新宣文阁正在营建,周伯琦所谓“至元六年十一月三日建宣文阁”即指建新宣文阁,地址选在大内宫殿建筑群之西北部,具体位置是玉德殿之东,延春阁之西面。欲明确新宣文阁之地理环境,我们有必要了解元大都宫

①陈高华:《〈元史〉纂修考》,《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25页。

②据研究,因元朝实行两都制,元上都亦分设奎章、宣文二阁,见日本石田干之助撰、包国庆译:《关于元上都》,叶新民等编:《元上都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页。因本文主要讨论大都奎章阁、宣文阁及端本堂三者关系,故从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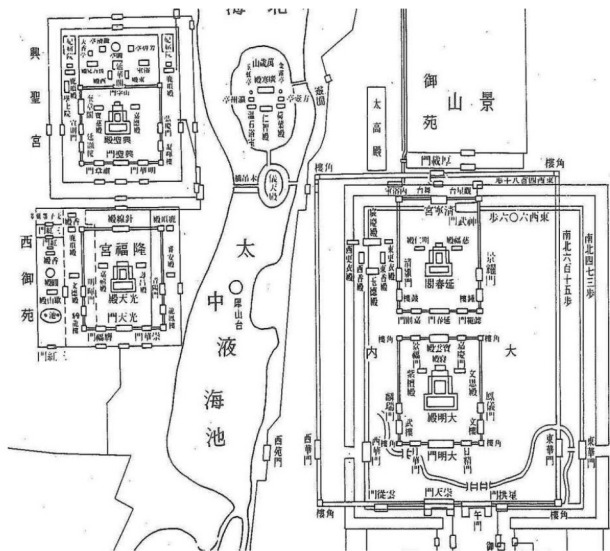
③(明)宋濂等纂《元史》卷九十二《百官八》,第2329页。

④(明)宋濂等纂《元史》卷四十《顺帝三》,第859页。

⑤(明)宋濂等纂《元史》卷一百四十三《巉巉》,第3415页。

⑥(元)周伯琦:《近光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殿建筑方位,据民国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之元大都宫殿平面图^①,直观地显示元大都宫殿主要有兴圣宫(图左上)、隆福宫(图左下)和大内(图右下)三大宫殿群。其中,兴圣宫(奎章阁、旧宣文阁位置)和隆福宫位于太液池(即今天北海和中海)西岸。大内位于太液池东岸,以南面大明殿和北面延春阁为



主要建筑,其中玉德殿和明仁殿分别位于延春阁西部、西北部(如图一箭头所指位置)。元人汪克宽《宣文阁赋》对新宣文阁之方位有翔实描述:

皇帝九年,制作宣文阁于大明殿之西北。皇上万几之暇,御阁阅经史,以左右儒臣为经筵官,日侍讲读……东望则延春之阁,崔嵬峥嵘,横绝天半,窅邈觚稜;西瞰玉德秘殿,啗曜月朗,渺太液之轻漪,涵天光而滉漾;北瞻则万岁之山……南眺象魏崖额。^②

“皇帝九年”为顺帝即位之九年,即至正元年(1341年),是新宣文阁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时间。周伯琦《宣文阁下直》其中二首诗句亦描述了宣文阁与周围玉德殿和延春阁之关系:其一,“玉德殿前红杏树,数花犹作去年看”。其二,“延阁(即延春阁)风微清蹕近,中天奎壁吐光芒”。^③汪、周二人诗赋同时印证了新宣文阁位于玉德殿东面、延春阁的西面。除此之外,《元史·顺帝纪》载:“(至正元年九月)壬寅,许有壬进讲明仁殿,帝悦,赐酒宣文阁中,仍赐貂裘金织纹币。”^④也说明新宣文阁与明仁殿位置不远。新宣文阁竣工并正式投入使用的时间是至正元年(1341)九月,见危素撰《君臣政要》序:

至正元年九月,皇帝御东宣文阁,出《君臣政要》三卷,召翰林学士承旨臣嚶嚶、学士臣朵参直班、崇文少监老老,传敕翰林侍读学士臣锁南、直学士臣拔实、崇文太监臣别里不花、少监臣老老、宣文阁鉴书画博士臣王沂、授经郎臣不答实理、臣周伯琦等,译而成书。^⑤

①朱偰:《元大都宫殿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②李修生编:《全元文》卷一五九三,第52册,第90-91页。

③(元)周伯琦:《近光集》卷二“宣文阁下直四绝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明)宋濂等纂:《元史》卷四十《顺帝三》,第862页。

⑤李修生编:《全元文》卷一四七〇,第48册,第196页。

“东”宣文阁不仅表明新宣文阁的方位,也说明此时新宣文阁已竣工并正式使用,原奎章阁临时所改的旧宣文阁则彻底废除。由此来看,奎章阁改宣文阁,不只是名称改变,地址也随后变更。

四、宣文阁改址之原因及其与端本堂之关系定位

宣文阁为何迁址大内,原因可归纳为三点。第一,旧宣文阁立于文宗奎章阁旧宫,阁内布置也是“存设如初”,并未作何改动。由于奎章阁为文宗亲手设置,出于对文宗的全面清算,建新宣文阁已是顺帝应有之意,当时周伯琦承诏篆“宣文阁”榜即为新宣文阁作准备,《近光集·十一月二十八日承诏篆题宣文阁榜作》诗“诏题宫榜号宣文,延阁(延春阁)山储尽典坟”说明奎章阁废除时,顺帝已于延春阁附近为新宣文阁选好地址,只是新宣文阁建设尚须时日,原来位于兴圣宫的旧宣文阁只起临时过渡作用;第二,为顺帝经筵和御前奏闻等活动提供便利。宣文阁迁址后,据周伯琦撰《近光集》和危素撰《危太朴集》等零散史料可知,顺帝经筵地点除宣文阁外,还有大明殿、明仁殿、咸宁殿等,而这些宫阙皆位于延春阁附近,离宣文阁不远。经筵侍讲、品鉴书画事毕,顺帝常于宣文阁中宴请讲臣。另外,御前奏闻也主要在大内玉德殿、大明殿、延春阁、明仁殿和宣文殿等举行。众所周知,皇帝寝宫也在大内,把新宣文阁建于此,也是出于方便顺帝经筵进讲、御前奏闻和御览书画等宫廷活动之考虑;第三,便于宫学活动之开展。元代宫廷教育机构除国子监外,奎章阁学士院亦设学宫,但此时学宫在宫城外,由奎章阁授经郎揭傒斯、苏天爵、林希彦、毕申达和赵仲礼等人为师儒,负责教育勋戚大臣子弟。新宣文阁建毕,宫学也由宫城外迁到玉德殿,如周伯琦自述:

明年改元至正,正月廿日,特命(周伯琦)为授经郎,复置经筵,又命兼经筵译文官。先是授经郎学舍在宫门外,隘陋弗称,于是有旨以玉德宫之西殿为学,上亲选宿卫官及勳戚子弟年二十以下者三十人为弟子员,受业阁下……是年,复科举……明年廷试,选为簾内官,上御宣文阁,试弟子员。^①

据此看来,宫学迁址为宣文阁授经郎如周伯琦、危素、贡师泰、王馥庆等人授经及顺帝亲试弟子员提供了便利。

宣文阁改址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何定位其与端本堂之关系上。目前学界对二者关系之误会可归为两类:一是至正九年端本堂成立后,宣文阁不复存在。持该观点的有民国朱偰和元史专家陈得芝先生等^②,该观点失实最甚,宣文阁实际上一直存在至元亡;另一类以台湾学者傅申、姜一涵和大陆黄惇诸

①(元)周伯琦:《近光集》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陈得芝主编:《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10页;民国朱偰也未认识到宣文阁改址,即误认为“两阁一堂”实为一体,见朱偰著:《元大都宫殿图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7页。

先生为代表,虽然认识到端本堂成立后,宣文阁仍然存在,但认为端本堂从属于宣文阁,或二者合二为一。如傅申先生推测“或者是端本堂原为隶属于宣文阁下的主要机构”^①。姜一涵先生认为“二者(宣文阁和端本堂)之间的关系是二而一的”^②。黄惇言“端本堂大体上只是宣文阁下设的一个机构”^③。为何后三家观点也是错误的呢?原来是认为端本堂设在宣文阁里,故前者属于后者,事实并非如此。其实诸位持此定论的依据是一致的,即明初史家王祎撰《端本堂颂并序》:

皇帝即阼十有七年,为至正九年冬。诏以皇太子春秋日长,宜亲师就傅以知学。拜谕德、赞善各一员……即兴圣宫西偏故宣文阁,改曰端本堂,以为肄学之所。^④

诸家之讹在于曲解了王祎原意,即只注意到了宣文阁改端本堂的事实,却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修饰词“故”字,也忽略了上文所引危素撰《君臣政要序》“皇帝御东宣文阁”之“东”字。“故”字说明改为端本堂的是旧宣文阁,位于兴圣宫里原奎章阁旧址;“东”字说明还有一个新宣文阁。实际上,正如前揭所言,旧宣文阁只存设不到一年,即1340年11月至1341年9月。此后东面大内西北部的新宣文阁建成并投入使用,史书里顺帝与朝官品定甲乙的书画鉴藏活动皆发生于此。此后旧宣文阁已废置,故八年后改为端本堂,主要职责是“执经道皇子”,属于东宫教育范畴。而宣文阁主要职责是经筵进讲和书画鉴赏,属皇帝御临机构,至元亡国先后有数十位人物任宣文阁授经郎、经筵检讨官和鉴书博士等职^⑤。要言之,端本堂除沿用旧宣文阁建筑外,二者并无其它关系。至正九年后,二者是并存的,职官设置与执掌均不同,故二者非从属关系,而是各自独立的平行机构。

【作者简介】赵利光,男,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与元代书法文化。

①傅申:《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台北故宫博物院,1981年,第63页。

②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第45-46页。

③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④(明)王祎:《王文忠公集》卷十二《端本堂颂并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人物》一书考证出宣文阁授经郎(正七品)四人,分别是王沂、周伯琦、贡师泰、樊持敬,笔者又考证出三人,分别是危素、王徐庆和王时可;同时该书考证出鉴书博士(正五品)七人,分别是王沂、周伯琦、麦文贵、归旸、李黼、杨俊民、郑深和刘某(即刘中守);王力春先后撰《元代王沂首任鉴书博士考》(《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04期)、《元人刘中守印甄考》(《美术大观》2009年12期)和《〈至正十一年进士题名记〉所录鉴书博士考》(《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05期)三篇论文对杨俊民、王沂及刘中守三位鉴书博士进行详细考辨,是为姜氏一书之补正。另,笔者又考证出王徐庆、王与、哈琳都及答禄与权四人。关于四人任职时间,见拙文《元宣文阁鉴书博士王徐庆考》,《中国书法》2017年第9期,第202-205页。